

历史回响与现实警钟

日本极右翼思潮的源流与复苏

□ 本报记者 苏宁

高市早苗担任日本首相以来，日本极右翼思潮正呈现全面复苏的危险态势。从安倍晋三执政时期开始酝酿的系统性右倾政策，到高市早苗上台后的急剧右转，战后长期蛰伏的极右翼势力已从政治暗流走向前台，开始登堂入室。日本极右翼思潮植根于其传统文化与历史基因之中，具有极强的顽固性与破坏力。要真正认清它的本质并保持高度警惕，就必须回到历史深处，探究日本极右翼思潮传承与变异的内在逻辑。

历史文化中产生

日本极右翼思潮的底色可追溯至江户时期的水户学。水户学以“尊皇”为精神核心，在“大义名分”的旗帜下，将天皇塑造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

明治维新后，后期水户学建构的以天皇为中心的“国体论”，成为明治政府巩固统治、凝聚民心的重要思想资源。明治政府通过建立国家神道、颁布《教育敕语》等制度性举措，将水户学所开创的国体思想与尊皇理念吸收并升格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进而逐步系统化为了“皇国史观”。它以“万世一系”的天皇崇拜为原点，以日本至上、对外扩张为逻辑延伸，成为此后所有右翼思想和行动的精神底色，为一切极端行为提供了效忠天皇的“理论合法性”。

进入20世纪20至30年代，日本内外矛盾急剧激化。被誉为“昭和维新始祖”的北一辉主张天皇权力被官僚、财阀和内阁窃取，号召少壮派军人发动政变“尊皇讨奸”。在北一辉思想蛊惑下，旧陆军内部形成了以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为核心的皇道派。1936年，皇道派发动“二二六兵变”，以“尊皇”之名起事，却恰恰触怒了裕仁天皇。兵变被镇压，皇道派遭彻底清洗。北一辉被处死，然而，皇道派的覆灭非但没有终结极右翼思潮，反而催生了一个更加沉着而危险的角色——以石原莞尔、东条英机为首的统制派。统制派在清洗皇道派后全面掌权，将极右翼思想从躁动的暴走升级为精密的统治与战争哲学。在“总体战”体制名义下将整个日本社会打造成一部战争机器。正是这种“理性”，使统制派有能力发动一场持久、全面且极端残忍的侵略战争。

从更深层次看，极右翼思潮在日本的产生发展，与日本特有的历史文化土壤密不可分。

日本存在一个关于天皇神性和血统延续的“政治神话”。纵观日本历史，院政的出现、武士的崛起以及历次动乱、政变，均系围绕天皇血脉的正统性展开角逐。天皇不仅是精神权威，更是政治权力不可替代的合法性来源——从源朝获封“征夷大将军”，到丰臣秀吉接受“太政大臣”官职，再到德川家康以《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将对将军的任命制度化，政治野心家之所以争夺“尊皇”的解释权，正是因为天皇拥有赋予统治合法性的最终权力。

蛰伏中潜滋暗长

极右翼思潮是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思想，本应随1945年的战败而被彻底清算。但事实是，它非但未曾消亡，反而在战后蛰伏数十年，最终在21世纪卷土重来、登堂入室。

二战结束之后，美国拟对日本进行彻底的民主化与“非军事化”改造，包括废除天皇制和追究战争责任。但随着冷战铁幕落下，美国对日政策发生一百八十度急转弯，不仅保留了天皇制度，还大规模停止了对军国主义分子的整肃。最具象征性的人物便是岸信介——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他不仅未被严惩，反而于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此后，



图为4月19日，人们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周围参加抗议活动，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新华社记者 贾浩成 摄

其外孙安倍晋三及其思想继承者，现任首相高市早苗，成为今日日本极右翼政治的核心代表。与此同时，战前庞大的官僚体系、财阀、政治势力基本被保留下来，日本战前与战后之间的联系从未被有效切断。

在和平宪法的约束下，战后右翼势力以更加隐蔽、迂回的方式潜滋暗长。明面上，日本宣示坚持和平主义，暗地里，否认侵略历史、摆脱战后体制束缚的暗流从未止息。1995年，战后50周年之际，时任首相村山富市最初的目标是在国会通过一项反省历史的“不战决议”，却遭遇自民党内保守势力的巨大阻力，包括安倍晋三在内的约半数议员共计251人缺席投票。最终，村山不得不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村山谈话”，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之顽固可见一斑。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日本政府百般辩解，但就连著名保守派思想家香山健一也承认，靖国神社是明治维新后国家神道的产物，“是日本的侵略、殖民以及军国主义的象征”，与传统多神教的神道教存在本质区别。

战后右翼势力的各个支流最终汇集在“日本会议”这一庞大的伞型组织之中。作为日本最大的右翼组织，“日本会议”拥有约3.8万注册会员，成员涵盖议员、地方首长、神道人士、财界要人，通过政治献金、选票动员和立法游说深度影响国家政策走向。高市早苗就是这一组织的核心成员，其政治理念与“日本会议”的目标高度重合。可以说，“日本会议”已成为右翼思潮从思想意识转化为现实政策的关键枢纽。

现实中全面复苏

如果说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是极右翼政策的蓄势期，那么高市早苗上台后，极右翼势力则进入了全面爆发的快车道。特别是在众议院选举大胜之后，高市政权来自党内和社会的制衡力量丧失，极右势力抓住时机在各个领域同时发力。

极右翼势力之所以迎来这一历史机遇，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社会上长期积累的矛盾已到了临界点。1990年泡沫经济

破裂后，日本陷入“失去的三十年”，经济长期停滞，实际工资不见增长，少子老龄化加速，社保体系濒临极限。日本从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跌落至第四，且被连续超越已是大概率事件，国民的不安与无力感形成深厚的社会心理土壤。与此同时，自民党内金钱政治丑闻反复上演，“政治与金钱”问题屡屡失信于民，国民对自民党早已缺乏信任。然而在野党同样令人失望，既无法提出可信的替代方案，也深陷内斗与碎片化泥潭，国民面对的是“无人可选”的政治困境。

高市早苗正是精准利用了这种政治真空。她以女性、勤勉、平民出身作为个人形象卖点，将社会不安巧妙转化为对外恐惧和民族激情。她将日本“没有未来”归因于“邻国威胁”，“自虐史观”，“战后束缚”和“外国人犯罪”，而其作为极右翼政治代表的真正危险却暂时得以掩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将外部威胁绝对化以凝聚内部认同的动员方式，与战前“国难当头”的论调在逻辑结构上有着惊人的同构性。

高市早苗获得超高支持率后，制衡机制开始系统性失效。在野党的反对沦为形式，自民党内中间势力的牵制也几近瓦解，全党被裹挟着跟随极右翼势力一路狂奔。

在政治领域，历史修正主义进一步抬头，否认侵略罪责、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大行其道；在军事领域，修宪扩军集中爆发，谋求摆脱战后体制束缚发明目张胆；在经济领域，国防预算连年攀升，所谓“经济安保”成为推动阵营对立、拉帮结伙的政策工具；在社会领域，排外思潮被公然纵容，外国人犯罪个案被刻意放大以制造威胁恐慌。近期“闹婚事件”的发生，表明这种政策取向正在对国际法和外交秩序构成直接冲击，日本自身也开始承受反噬。

回顾历史，当前日本呈现出诸多与战前高度相似的征兆。当国会、媒体、国民等一切制衡均告失效时，历史悲剧便有可能重演。认清极右翼思潮的本质并保持高度警惕绝非杞人忧天，而是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的现实要求。

法国参议院通过文物返还法律草案

□ 本报见习记者 王婉娟 □ 本报记者 王艺茗

当地时间5月7日，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了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文本此前由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并于6日在国民议会表决通过。

有分析指出，这一关键进展为简化法国非法所获他国文物的归还程序进一步扫清法律障碍。

长期以来，法国《遗产法典》中“公共藏品不可转让”的原则，让其殖民时期非法获取的文物归还陷入了“一事一法”的尴尬困局——每一件文物的返还都必须逐案提交议会专项立法，程序繁琐且耗时漫长，让流失文物的追索之路步履维艰。2021年，法国向贝宁归还26件皇家文物，从启动协商到最终完成返还，整整耗时3年，这一案例也成为此前低效返还模式的真实写照。而此次达成共识的法律草案，正是为破解这一困局而生。

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出访贝纳法索时，首次承认法国殖民时期对非洲的文物掠夺，并承诺5年内推动文物回归，这被外界视为法国重新审视殖民历史、修复与前殖民地国家关系的重要信号。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2026年1月，参议院审议通过《关于向非法占有而失去文化遗产的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法案》，允许向原属国归还法国公共机构收藏的以非法方式取得的外国文化财产。对/张胜利

通过。

从草案内容来看，其核心突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不仅简化了归还程序，更明确了返还范围和审核程序。草案将1815年11月至1972年4月期间“通过殖民侵占、战争劫掠、强迫征收等非法方式获取的艺术品和文物”纳入适用范围，其中就包括了圆明园文物、敦煌藏经洞文物等中国流失文物。二是由政府通过行政法令作出决策，将原本需要数年的审批周期大幅缩短，提升了返还效率。三是建立了双重审核机制，由法国与文物请求国联合组建的双边科学委员会负责审查文物来源的非法性，再经法国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最终审议，采用五分之三成员反对方可驳回的投票制。

不过，不少学者也认为，草案将时间范围限定为1815年11月至1972年4月，未覆盖全部殖民史，时间范围以外的仍需要通过民事诉讼法解决，追索难度仍存。大量以“战利品”名义被劫掠后流入私人手中的珍品，以及部分来源复杂的考古文物，仍被挡在归还之门以外。同时，法国政府保留最终否决权，为文物返还留下一定模糊地带。因此，报道指出，这一法案并非“自动归还按钮”，请求国需充分举证并满足保管条件，这对资源匮乏的非洲国家是不小挑战，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实际返还与预期存在差距。

法国这部文物归还法案虽存在时间划定局限、条款界定模糊、法方保留最终主导权等短板，但它仍是全球文化去殖民化与文物追索进程的重要一步，打破了法国百年法律桎梏，也为世界各国追索流失文物提供了立法参考。

域外传真

□ 本报驻韩国记者 王刚

当地时间5月6日，韩国政府正式宣布组建全新跨部门专项机构——数字性犯罪受害者综合支援团，旨在打破各部门行政壁垒、整合执法与监管资源，着力解决长期以来数字性犯罪打击滞后、受害者维权困难等痛点，全面提升国家层面应对数字性犯罪的综合能力。

现存体系暴露多重短板

近年来，韩国数字性犯罪呈现高发、频发态势，犯罪手段不断迭代升级，已成为威胁普通民众人身权益、扰乱网络空间秩序的突出社会问题。

随着数字技术与移动互联网的快速普及，传统性犯罪逐渐向网络空间延伸，公共场合秘密拍摄、非法影像传播、深度伪造色情内容、网络性勒索等新型数字性犯罪形式层出不穷，犯罪隐蔽性更强、传播速度更快，受害者群体覆盖面更广，给韩国社会治理带来极大挑战。相关数据显示，韩国每年数字性犯罪报案量超1.7万起，且案件数量呈持续增长趋势，其中深度伪造技术引发的性犯罪案件增速尤为迅猛。

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韩国针对数字性犯罪的治理工作在明显的部门协同短板。此前，韩国政府虽先后五次制定跨部门综合对策，但各部门各自为政、行政程序繁琐等问题始终未能解决。韩国广播媒体通信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坦言，以往针对受害者明确的非法拍摄影像，需经过广播媒体通信审查委员会多层审议程序，才能自动链接切断操作，极大延误了犯罪阻断的最佳时机。

同时，大量非法有害内容依托海外服务器传播，单一部门难以开展有效行动，加之违法内容反复上传、平台方拒绝配合删除等问题，导致韩国损害持续扩大，受害者陷入长期的身心折磨。此外，现有法律体系对数字性犯罪的惩戒力度不足，监管范围有限，平台事前监管责任缺失，进一步纵容了数字性犯罪的滋生蔓延。

整合多方资源统筹施策

新机构依据韩国国务总理训令正式设立，整体隶属于女性家庭部，是韩国首个聚焦数字性犯罪的综合性应对机构。

机构采用专职专人配置，团长由女性家庭部安全人权政策官兼任，设1名副团长及7名核心团员，成员来自女性家庭部、广播媒体通信委员会、警察厅三大核心部门，涵盖法律监管、网络侦查、受害者援助等多个专业领域，实现了政策制定、执法侦查、平台监管三大职能的深度融合。

在成立仪式上，韩国各部门负责人纷纷表态，释放出对数字性犯罪“零容忍”的明确态度。女性家庭部部长元敬京表示，数字性犯罪通过非法素材的无限复制扩散，给国民日常生活带来严重威胁，如今已到了必须采取根本性治理措施的关键阶段。“新机构成立后，韩国政府将摒弃以往单纯的内容删除模式，构建全链条强力应对体

韩国组建跨部门机构「专盯」数字性犯罪

系，快速切断非法影像流通渠道，对反复传播、拒不删除的违法主体，动用一切法律手段追究到底，全力守护国民合法权益。”

广播媒体通信委员会委员长金钟哲指出，新机构的成立，标志着韩国建立起政府层面快速高效的数字性犯罪应对体系，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广播媒体通信委员会将严格落实平台方履行非法内容管理义务，强化互联网企业主体责任，与女性家庭部、警察厅等部门无缝协作，形成治理合力，全力根治数字性犯罪乱象。

构建全链条应对机制

报道称，新组建的数字性犯罪受害者综合支援团明确了全方位、全链条的工作职能，构建起“快速阻断、精准侦查、全面援助、制度完善”的一体化应对机制。

比如，在非法内容管控方面，机构将深度分析非法拍摄影像的流通渠道、重复上传网站的运营模式，网络性勒索等新型数字性犯罪运营商对受害者明确的非法影像链接进行快速切断，省去繁琐的中间审议流程；针对跨境传播等重大紧急案件，由机构直接牵头处置，打破部门协作壁垒。在制度完善与平台监管上，将推动修订《性暴力处罚法》《电气通信事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数字性犯罪的惩戒力度，明确平台方事前审核、快速删除的主体责任，要求平台在监管机构下达指令后24小时内完成违规内容删除，同时建立普通民众与企业便捷举报渠道，全面打击犯罪生态链条。

与此同时，韩国政府同步推出配套强化举措，构建技术监测与法律惩戒双重防线。一方面，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网络深度伪造性内容的实时自动监测，设立专门举报电话与线上举报网站，拓宽违法线索收集渠道；另一方面，大幅提升数字性犯罪惩戒标准，根据最新修订的处罚规定，持有、购买、存储或观看深度伪造淫秽影像的人员，将面临最高3年监禁或3000万韩元（约合15万元人民币）罚款，制作、编辑并传播相关影像的人员，刑期从原先的5年提高至最高7年，

针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数字性犯罪，将依法予以从重处罚，以严苛法律震慑潜在犯罪行为。

警察厅代厅长柳在成强调，数字性犯罪是对受害者身心造成永久性伤害的严重暴力犯罪，警方将依托机构平台，整合尖端侦查技术与跨部门监管资源，以“零容忍”原则严厉打击各类数字性犯罪，全力追查每一名违法犯罪嫌疑人，确保其受到法律的严惩，彻底摧毁数字性犯罪生态链条。

此次韩国组建跨部门专项机构，加码数字性犯罪治理，既是应对当下网络犯罪乱象的紧急举措，也是完善国家数字治理体系的重要探索。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持续发展，数字性犯罪仍面临不断变异升级的风险，跨部门协同、跨境联合执法已成为全球治理此类犯罪的必然趋势。业内专家表示，韩国新机构能否真正打破治理难题，能否为受害者提供全面且长效的援助，仍需在实际运行中接受实践检验。

俄罗斯国家级反诈信息系统上线运行

□ 本报记者 吴琼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速，俄罗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猖獗态势。从冒充公职人员实施诈骗，到利用“木马”病毒和NFC技术窃取资金，犯罪分子的手法不断迭代，涉案金额屡创新高。俄罗斯内务部数据显示，仅2025年前10个月，电信网络诈骗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已超过1540亿卢布。面对这一严峻挑战，俄罗斯政府痛定思痛，采取一系列雷霆手段。从近期正式投入运行的新版国家反诈信息系统，到政府牵头、多方联动的综合治理，再到密集出台的法律法规，俄罗斯正在构筑一张立体、多维的反诈防护网。

运行新版反诈信息系统

面对日益组织化、技术化的诈骗团伙，依靠个别部门或企业“单打独斗”已难以奏效。为此，俄罗斯在“数字经济”国家计划框架下，推出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基础设施项目——全新的国家反诈信息系统。自3月1日起，该系统正式投入运行，标志着俄罗斯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网络犯罪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

这一新系统的核心逻辑在于“打破信息孤岛”，通过整合银行、电信公司和政府机构的力量，实现数据的跨部门协同。系统启动之初，俄罗斯主要移动运营商、国家公共服务平台门户平台（Gosuslugi）以及多家骨干银行已率先接入。这种数据汇聚产生了显著的协同效应，使得有关部门能够在诈骗行为得逞之前，实时识别并阻断威胁。

作为国家级反诈基础设施，这一系统规划目标宏大，短期计划接入2500家各类机构，长期目标覆盖不少于两万家机构，全面打通金融、通信、政务、科技等领域数据壁垒。目前系统处于试点运行与功能拓展阶段，仅少数试点组件实现商业化运转，全功能上线仍需数月调试优化。

信息技术专家分析指出，该系统最大优势在于实现跨行业数据协同，可在诈骗行为实施前捕捉异常信号；但同时面临技术适配难题，数千家机构IT基础设施、数据标准、接口规范各不相同，需完成全维度统一化改造，且系统需实现实时响应，任何预警延迟都可能导致防护失效，技术攻坚仍任重道远。

多方参与织密反诈防线

新版国家反诈信息系统的上线，只是俄罗斯反诈矩阵

中的一环。在宏观层面上，俄政府正牵头构建一个覆盖事前预防、事中拦截、事后追责的多层次反诈体系，全方位织密反诈屏障。

在政府高层的直接推动下，跨部门协作日益紧密。在俄总理米舒斯京的直接领导下，俄罗斯计划在2026年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公民生物识别数据库。未来，银行将能够利用面部、声纹等生物特征数据精准验证身份，从物理根源上防止未经授权访问。同时，俄罗斯还积极探索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以期更精准地识别并拦截诈骗电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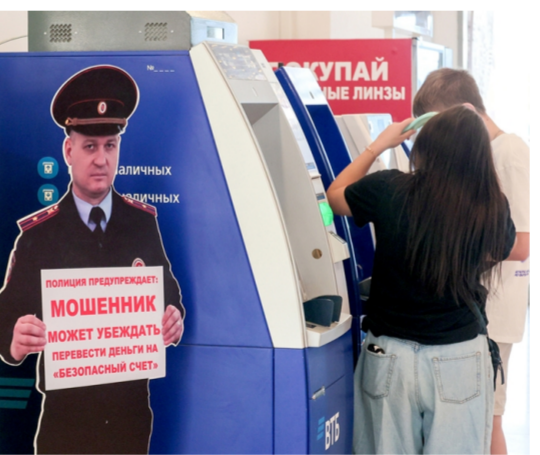
作为防范资金流失的“守门员”，俄罗斯金融机构发挥了关键作用。俄央行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共拦截7200万笔可疑交易，避免了约13.5万卢布的潜在损失。根据最新规定，当银行发现可疑或非自愿交易时，有权在48小时内将ATM的每日取现额度上限严格设定为5万卢布，直接切断大额资金的流出通道。

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各大网络平台主动承担起打击电信的社会责任。2025年5月，俄罗斯最大的国家公共服务平台门户平台Gosuslugi推出了“防范电信和网络诈骗”专项服务。该服务堪称公民的“数字防弹衣”，用户不仅可以实时查看个人信用记录、管理贷款权限，一键屏蔽可疑来电，还能直接举报诈骗电话与恶意网站。该服务上线不久，注册用户便突破300万，极大地降低了公众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

相关法律体系不断完善

技术防线与多方联动需要坚实的法律后盾，俄罗斯各界深刻认识到，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是一项长期系统性工程，必须坚持“法律先行”，通过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填补漏洞、扩大执法工具箱。

2025年6月，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通过了包含约30项反诈措施的一揽子法律法规，涵盖通信、金融、科技等多个关键领域。在通信领域治理方面，新规大幅加强了对手机SIM卡发行的管控，严格落实实名认证制度，从根本上挤压



图为在俄罗斯伏尔加格勒，警方警告民众警惕电话诈骗，ATM机附近设置了一个真人大小的警察立牌，上面写着“骗子可能会说服你把钱转到一个‘安全账户’”。

CFP供图

了诈骗分子使用“黑卡”的空间。

在刑事追诉方面，2025年9月1日，俄罗斯刑法典新增的计算机信息领域反诈专项条款正式生效。条款显著加大了对利用木马病毒、恶意软件窃取资金及个人数据行为的量刑力度，让法律真正长出了“牙齿”。

俄国家杜马信息政策委员会主席博亚尔斯基在今年3月中旬明确表示，国家杜马正准备下一批政府反诈立法草案的二读工作，且第三批修正案也已提上日程。这种“滚动式”立法模式，体现了俄罗斯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诈骗手法不断翻新，法律也保持动态调整，通过持续完善立法，确保执法机构在面对新型、复杂的电信诈骗案件时“有法可依、执剑有锋”。

从千亿卢布的惊人损失，到如今发案率的显著下降，俄罗斯的反诈之路走得艰难而坚定。新版国家反诈信息系统的运行打破了部门壁垒，政府牵头的多方联动织就了天罗地网，不断完善的法律体系则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持久战，俄罗斯通过“技术+协同+法治”模式，不仅为保护本国公民的“钱袋子”探索出有效路径，也为全球各国应对这一世界性威胁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